

大眾儒學系
孔學堂書局

◆ 大师说儒

文化与理想

林语堂说儒

张卉
编著

大眾儒學書系

◆ 大师说儒

文化与理想

林语堂说儒

张卉

编著

总序

舒大刚



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每一个具有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导师和精神家园，正是由于有文化导师才启迪了民族的智慧，也正是由于有精神家园才安顿和滋养民族的心灵，使之不断发展壮大、生生不息，从辉煌走向辉煌。古希伯莱人之有摩西及《旧约》，古希腊之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哲学”，古印度之有婆罗门、释迦及《吠陀》《奥义》和“佛典”等等，无不如此。自古雄踞于世界东方、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导师和精神家园，那便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构成的圣贤群体，和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宗旨的儒家学说。正是由于有了儒家及其《六经》、“仁义”的推行与传播，才使中国文明成为举世无双，唯一没有断绝、而且还不断焕发新生的古老文明。

一、什么是儒学？

提起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既明白又糊涂。说对它“熟悉”“明白”，是由于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无论是崇敬它还是反对它，孔子和儒家及其《六经》都是国人不断称说和屡屡道及的热门话题。说对它“陌生”“糊涂”，是由于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形成反传统、反儒学、反孔子思潮后，《六经》的真内容、孔子的真形象、儒家的真精神、“仁义”的真精髓，已被严重歪曲甚至妖魔化，儒学的真面目被蒙上层层灰垢，已是大义不明、真相莫辨了。

关于儒家及其学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有非常精辟的概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可见，儒家乃是孔子继承二帝三王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典籍，而创立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学派。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儒家的功能是帮助人君顺应天地之道（“顺阴阳”）、宣明人伦道德（“明教化”）；他们研习的经典是《六经》，他们宣扬的理论和纲领是“仁义”，他们还是古老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推崇唐尧、虞舜的禅让精神，效法周文王、

武王的礼乐文明，而以孔子为自己的创派祖师。作为汉家正史的观点，应当代表了儒学昌明时代最正统、最普遍的主流意识。

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又是何许人呢？《庄子·渔父》借子贡之言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整齐）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可见，孔子是有修养、有道德（“性服忠信”），有行为风范（“身行仁义”），有文化追求（“饰礼乐”），有人文关怀和学术归趋（“选人伦”），有特定社会功能（“上忠世主”“下化齐民”），有大众化价值取向（“利天下”“化齐民”）的一代圣哲。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他书中有关孔子的评价，应当不是太过脱离实际的恭维。

儒家所诵习（“游文”）的《六经》又系何物呢？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献大国，三皇五帝时已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由于没有圣贤传授，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文献沦落了。从尧舜，经夏商，及乎周代，文献积累，郁郁乎文。至春秋时，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形成了《六经》。关于《六经》的内容，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其为“旧法世传之史”（分见《庄子·天下篇》及《天运篇》），《六经》无非历史文献：《诗经》是商、周及春秋早期的诗歌总集，《书经》是尧、舜及夏、商、周三代文诰教令汇编，《礼经》是行为规范及制度设施的记录，《乐经》是音乐资料，《易经》是讲明阴阳观念及其应用的文献，《春秋》记载了公元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至前四八一

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的历史。但一经孔子整理和用来教学，《六经》便具有历史教科书性质，具有教化意义了。《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举凡性情怨慕之怀，家国天下之政，人伦教化之行，天道性命之理，君臣父子之等级名分，孔子无不精思而详说，以体天地之心，以立生民之极。春秋战国时期，《六经》是催生诸子百家的智慧源泉。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六经》又成了中国人启蒙和益智的教材、著书立说和安身立命的经典。在中国有文字记录的五千年文明中，恰以《六经》为中心，前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因它而得到记录和延续，后两千五百年的智慧和文明也由它得以开启和点燃。可见《六经》就是中华文化承上启下、原始要终的圣典！

那么儒家所“留意”的“仁义”又为何事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颜渊》及《卫灵公》）《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仁本质是爱，爱父母即是孝，爱兄长即是悌，“孝悌”是仁义最基本的内涵，也是人类最根本的伦理。若能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甚至尊贤、敬长、忠君等，将仁爱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做得恰到好处，实行最广泛、最有序、最合理的爱，就是“仁义”。“仁义”即是在一定的规则下，人类自觉而又自律地推行最普遍、最理性的爱。



儒家以圣贤为导师，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宗旨，以“明教化”“利天下”为目的，从而树立起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教育为先”“人文化成”的传统。儒家诞生后，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甚至东方各国文化的灵魂和主干，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引导中国文化走向辉煌的指南北斗，是铸造中国文化特质的规矩准绳，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成为维系东方第一大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力量。儒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奠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民胞物与”“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品德和价值观念，至今仍然是13亿中国人和数千万海外华人侨胞共同的文化心理和道德律条，是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促进国际和平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二、“中国梦”与儒学教化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大潮下导致了“中学”迷失，因“疑古过勇”带来了文化虚无主义。民国初建，即将传统“经学”废除了，一时之间，废书院建学堂，拆孔庙办学校，毁中学兴西学，成为时代潮流。中国人信守了2000余年的“仁

“义礼智信”等思想观念和“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条教也随之瓦解，烟消云散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也已摆脱贫积弱、列强侵逼的生存状态，俨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三大军事强国，在诸多方面已经足以一洗百年耻辱了。可是，大家在欣赏中华国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在感叹当下社会“道德失范、人心不古”，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人个品德”方面令人担忧，甚至出现“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富而不贵，安而不乐”等现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长期缺乏最起码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修辞立诚”“义利之辨”等文明教养和道德塑造，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孔子早就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亦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岂不然哉！

《论语·先进》载孔子与弟子“言志”，子路欲用三年时间来“强兵”，冉求欲用三年时间来“富民”，公西华欲用三年时间来“兴礼乐”，最后才是曾点所向往、孔子所赞赏的“悠然与天地同乐”的幸福境界。这场对话恰好反映出一个政权的建设必经的几个阶段。我们的党在经过了近三十年“武装斗争”夺得政权、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政权、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纲”发展经济之后，现在理所当然应是逻辑地进入“以文化建设为纲”亦即大兴礼乐教化的阶段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发出“加强文化体制改革”，



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号召；十八大又明确制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大“中国梦”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明确指出：“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还高度评价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说“我们要考虑把这种人类进步的思想如何具体化。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应考虑在中国大地上如何更好地推行。”如此等等，当代国人实现古贤“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理想的契机，其在此乎！

三、“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成果层见叠出、成绩不菲，可是在弘扬儒学的淑世济人功能，推动经典普及和礼乐重兴，贏取社会大众参与和实践力行等方面，还有待全面展开。前引古文献一再表明，孔子及其儒家的真精神就是“服忠信”“行仁义”“选（整齐）人伦”“化齐民”“利天下”和“明教化”，这是儒学行之两千年而无弊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鉴于此，近年来，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阐明儒学的教化功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诸如“生活儒学”“公民儒学”“君子儒学”“制度儒学”“政治儒学”“宗教儒学”“民间儒学”和“儒学大众化”等，开始了儒学经世的新尝试。四川大学的学人在从事《儒藏》编纂和“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在寻求儒学为大众服务的途径。2007年至2010年间，笔者承

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组织“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之《儒家孝悌文化》任务时，便萌生撰写一本《大众儒学》的想法。2014年3月，郭齐勇先生莅临四川大学作“民间儒学”演讲，促使我们正式形成“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并行发展的构想。同年5月，在贵阳举办的全国图书馆配交流会议期间，有感于贵州省委、省政府“冲出经济洼地、打造文化高地”的气魄和举措，笔者与曹维琼先生、张忠兰女士共同达成《大众儒学书系》编写计划，并形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普适性传播、大众化推行”的儒学现代传播理念。

所谓“经典儒学”，主要是从经典阐释、学术研究层面切入，注重学术性、总结性、创新性和传世性，其所产生的成果主要以“藏诸名山、传之久远”为目的。所谓“大众儒学”，主要是从民生日用、推广实行层面切入，注重应用性、针对性、操作性和普适性，其所产生的效果主要以“传之民间、显诸日用”为归趋。从前我们所从事的以儒学文献整理、经典诠释、学科重建、学术转化和理论更新为内容的研究（包括《儒藏》），都属于“经典儒学”的范畴。至于有识学人和民间人士自发地从事的以庙学重建、礼义振兴、道德重构、民间日用和社会实践为内容的活动，当属于“大众儒学”的范围。“经典儒学”和“大众儒学”相偕而行，学术并重、体用兼该，才能适应学术繁荣和文化重建的形势，也才能使儒学实现其浴火重生、淑世济人的当代复兴。

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普适性传播、大众化推行”是儒学当代复兴的指导方针。首先我们提倡全面系统



地研究和阐释儒学，力促实现古典经学和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当代创新。本丛书计划梳理和阐释的儒学体系，大致有三个层面：一、儒家信仰体系和价值系统：讲清儒家的基本信仰、精神家园，及其价值体系和人生追求。中国是一个缺乏全民宗教的国度，但儒学通过总结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而形成的“天命”“鬼神”“礼乐”等“三统”学说，在历史上实际起到了精神家园和价值信仰的作用。二、儒家的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儒家基于人伦教化，曾构建有系统的道德观念、礼仪条教和行为守则，如“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以及“五常”“十义”“五礼”“百仪”等主要守则。三、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系统：如“礼乐射御书数”等道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兼及儒相、儒将、儒商、儒士、儒媛等在“治国安邦”“义利取舍”“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笔墨纸砚”“剑骑钓猎”“山水丘壑”“进退出处”等方面表现的儒者情怀和风雅才艺，等等。丛书的撰写方式，力求“普适性”和“大众化”，以大众化的语言、从普适性的角度，将儒学的体系和内涵讲清楚，说明白。

丛书拟分以下专辑：儒经（“六书”“十三经”导读），儒典（重要儒学理论文献导读），儒教（儒家宗教性及其信仰），儒礼（儒家礼仪文化分类解读），儒行（儒学伦理与修养），儒言（儒学格言分类通览），儒理（儒学理论分类解读），儒史（儒学流变及流派史话），儒林（历代名儒传记），儒文（儒学辞章选读），儒雅（儒家风雅文化与生活情趣），以及儒相、

儒将、儒商、儒士、儒媛等群体，共约 15 个专题，每类预计 5—10 种不等，每种 8—10 万字以内，分期分批推出。至于撰稿作者，则采取开放方式，凡有兴趣、有见解的学人，都在欢迎约稿、投稿之列。为尽快满足大众读者的渴望，特别是为了给本丛书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我们特别选介了 20 世纪 10 余位学术大师的儒学成果，并约请当代 10 余位儒学名家提炼自己的儒学成就，作为本丛书的首批出版物向世人推介。

当年艾思奇撰著《大众哲学》宣传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曾武装了大批革命志士的头脑，最终促成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人参与《大众儒学书系》撰稿，向人民大众系统普及儒学知识及其核心价值，正面传输崇高道德风尚和优雅思想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以崭新风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贡献力量。

若有未及，希望识者补正。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晚
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目 录

林语堂小传 001

导 读 003

第一章 林语堂的孔子观 011

第一节 孔子的真性情 012

第二节 孔子的贵族气质 025

第三节 孔子是古代文化的
总结者和集大成者 028

第四节 孔子的教义 030

第二章 林语堂品儒学 044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精神 045

第二节 “四书”思想 055

一、《中庸》 056



二、《大学》 075

三、《论语》 078

四、《孟子》 105

第三节 儒家的教育思想 116

第四节 儒家的理想社会 129

第五节 儒家的礼与乐 131

一、礼文化 132

二、乐文化 141

第三章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和道家文化之比较

..... 155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比较 156

一、中西思想法之不同 158

二、直觉与逻辑之差异 160

三、西方文化的困境 163

四、宋明理学之困境 167

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之比较 177

附录 林语堂部分著述 186

林语堂年谱简编 189

后记 192

林语堂小传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生，福建人，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排行第五，谱名和乐。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他在厦门度过了他的小学、中学时光。1912年入上海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学校，教授英语，1919年，与廖翠凤结婚，婚后即携夫人同赴哈佛大学留学，二人生育了三个女儿，他们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成为了一段佳话。后其由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转往德国耶那大学补修学分，192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胡适的资助下，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中国音韵学。1923年，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上海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教授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等行政职务。彼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局势，他开始署名语堂，先后在《语丝》、《中国评论周报》等杂志发表文章，多以批判国内外政治、军事为主。1932年，1934年，1935年分别创办并主编了《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半月刊、《宇宙风》

半月刊以唤醒民众。1935年，林语堂写作并出版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一举成名，享誉国内外文坛。1936年，全家赴美，居于纽约。此后，林语堂潜心致力于写作，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大师。先后出版了《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中国印度之智慧》《啼笑皆非》《苏东坡传》《唐人街》《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武则天传》《朱门》《赖柏英》《红牡丹》等著述，林语堂还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有着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和深厚的国学功底，英文造诣也极高，他许多有名的著述都是以英文发表和出版的。他文风犀利，语言诙谐，寓意深刻，故林语堂又被称之为“幽默大师”。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写了许多关于东西方各国文化的文章和专著。常年旅居国外的林语堂，有着浓烈的中国情结，他忧患祖国的命运，关切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晚年的林语堂回到中国台湾定居，于1976年3月26日逝世。

导 读

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关注点除了文学之外，最常论及的就是各国的文化。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本书以林语堂对儒学的论说为对象，围绕着他对儒家经典、儒家文化的解读而展开。他对儒学的阐释深刻而独到，犀利而幽默。他始终是以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待儒家文化，但我们从他对儒家文化批判性的反思中，看到了他对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深沉的热爱，就像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一般。

林语堂对中国儒学史的划分实际上只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孔孟儒学，第二是孔孟以后的儒学，在他看来，前一个阶段是真儒学，后一个阶段是假儒学。他认为前一个阶段的儒学刚健有力、自强不息、幽默近情，而后一个阶段的儒学尤其是经过了宋明理学之后，变得虚静空无、毫无干劲、严肃禁欲。故林语堂是将孔子及其思想与其他儒家及其思想区别开来的。他指出，孔子不是